

文 學 / 滄海叢刊 / 東大圖書公司印行



牛李黨爭與唐代文學

傅錫壬著

I 206.2

149

I 206.2
571

xue wen dai tang yu zheng dang li niu
學文代唐與爭黨李牛

著 壬 錫 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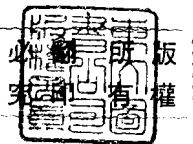
滄海叢刊

行印司公書圖大東

中華民國七十三年九月初版

◎牛李黨爭與唐代文學

基本定價叁元柒角捌分



著者 傅錫
發行人 莊剛
出版者 東大圖書有限公司
總經理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所 東大圖書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六十一號二樓
郵政劃撥一〇七一七五號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 局版業字第一〇九七號

本書承國科會獎助

自序

讀書是終「生」大事，所以我替自己安排了一個遠期讀書計劃：四十歲以前讀文學，四十到五十歲讀歷史，五十歲以後讀哲學，尤其是宗教哲學。因為凡人在四十歲以前多比較感情用事，把世事看得華艷溫馨，對人生充滿了憧憬和眷戀。他的情懷多能與文學的情趣相投。到了四十歲以後，不但需為事業的成就而奔波，更為家庭的負擔而勞累，雖然挫折、碰壁在所難免，往往讒嫉、毀謗也接踵而來。此時他的心境是堅忍而悲憤的，這時唯有從激盪的歷史洪流中，去尋求慰藉和寄託。因為只有歷史能證明，何者為真正的善良與虛假的邪惡。到了五十歲以後，他已參悟了人生的虛空，年邁的雙親往往就在此時故逝。這時他的情緒沉陷進哀怨、悽絕。對人生的態度是無常。這時他的心靈面臨到一次枯涸的打擊，於是唯有宗教家的偉大情操，才能挽回他的消沉。

得。

這本「牛李黨爭與唐代文學」的小書，就是我邁入四十歲以後，讀歷史中體驗到的些微心得。在我國浩瀚的歷史賡續中，我為什麼獨鍾愛於從唐代的「牛李黨爭」以為讀史的起程呢？

第一：唐代的「牛李黨爭」從開始到結束，整整延續了四十年。使它成為了一個結構非常完整的研究個體。

第二：唐代是一個文風鼎盛、文體已備、文士衆多的時代，歷史與文學的相互影響力可以達到深而廣的層面。

而且更藉着歷史與文學相互交錯的某些現象中，窺見了當代歷史的真象，或透析了文學的表面，探觸到了和人類接觸更廣泛的文化意義。

不論這本小書在學術研究的價值與意義上是否能被肯定，但我一直堅信歷史與文學的整合性研究，是未來必須走的一條路。在未來的一、兩年中，我計劃再去讀宋代的歷史，以備完成一本以宋代文化背景為主體的「元祐黨爭與宋代文學」的論文。從此讓自己的讀書領域不斷的擴充。

這本小書原名叫「唐代牛李黨爭與當時之文學關係析論」，是我於七十一年畢業於師大時的博士論文。在論文的構思、撰述中，承臺師伯蘭、邱師璧友的多方指導、啓示、糾謬、鼓勵。使我不至半途而廢，在此謹誌最誠摯的謝意。又論文曾蒙國科會贊助，在此也一併誌謝。

傅錫壬

七十三年六月

於淡江大學

牛李黨爭與唐代文學 目次

敘論	一
第一章 牛李黨爭的始末	一一
一、黨爭的肇始	一一
二、形成的原因	一八
(一) 帝王的牽制策略	一八
(二) 宦官的操縱左右	二三
(三) 外廷的權力爭奪	三四
三、黨爭中的幾件大事	四五
(一) 李逢吉之謗毀裴度	四六
(二) 李逢吉之迫害李紳	四八
(三) 李宗閔引牛僧孺共排李德裕	五〇

(四) 李德裕排斥李宗閔黨·····	五一
(五) 李逢吉之排斥李德裕·····	五二
(六) 李德裕李宗閔同遭斥逐·····	五三
(七) 李德裕之再斥牛僧孺、李宗閔·····	五四
(八) 白敏中之排斥李德裕以及德裕之死·····	五六
第二章 黨爭與史料鑑別·····	五七
一、通鑑考異中提到幾種因牛李黨爭而竄改的史書·····	五八
二、兩唐書所論「牛李黨爭」的歧異·····	七三
三、唐人筆記小說中的牛李傳聞·····	九六
第三章 黨爭與文學·····	一二一
一、假借散文以揭示私見·····	一二三
(一) 黨人論「朋黨」·····	一二三
(二) 牛李的幾篇攻訐散文·····	一三六
二、利用詩歌以發抒恩怨·····	一五〇
(一) 從韓愈的「南山有高樹」談起·····	一五〇
(二) 李紳「趙翰苑遭誣構四十六韻」詩之史實背景·····	一六五

(三) 楊虞卿的虔州之斥	一七九
(四) 庭筠詩中的溫「李」情誼	一八九
三、編撰小說以攻訐政敵	一九九
(一) 試探李娃傳的寫作動機及其時代	一九九
(二) 蔣防霍小玉傳的創作動機	二一七
(三) 周秦行紀的再審視	二三三
第四章 黨爭與文士	二五一
一、捲入了黨爭的糾紛	二五二
(一) 沒落中的舊族——元稹	二五二
(二) 杜牧與牛李之恩怨	二六五
(三) 李商隱的婚姻與黨爭	二八五
二、擺脫了黨爭的羈絆	三〇六
(一) 退守自保的劉禹錫	三〇六
(二) 不為朋黨所累白居易	三一三
總結	三三五
附錄一：牛李黨爭大事年表	三四四

附錄二：牛李黨爭有關人物年里科第表·····	三五七
參考資料舉要·····	三六〇

敘論

一、朋黨正解

朋黨的形成以致萌生黨爭，是古代帝王政體下，士大夫間權力爭奪後的必然結果。所以宋歐陽修曾說：

「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朋黨論）

然而黨爭後所造成的不良影響，輕則止於相互攻訐，誣謗他人名節，重則擾亂朝政，加速國家滅亡。因此，歷代君主，凡是勤政愛民的，對朋黨都是深惡痛絕，除之猶恐不及。

當唐憲宗元和三年（西元八〇八）到宣宗大中三年（西元八四九），外廷士大夫間，黨爭頻

頻不斷。若推尋兩黨主事的領袖，則多數後代的歷史學家，都歸罪於牛僧孺和李德裕。於是就統稱這四十餘年的動盪朝局，謂之「牛李黨爭」。

實際上，黨爭期中，兩黨都相互指責對方爲朋黨，而自居於君子。那麼究竟誰是朋黨？朋黨的真正界說又如何？我想就從他們自己的言論中去探討，必是最爲直接了當的。據李絳說：

「臣歷觀自古及今，帝王最惡者是朋黨，姦人能揣知上旨，非言朋黨不足以激怒主心。故小人譖毀賢良，必言朋黨。尋之則無迹，言之則可疑，所以構陷之端，無不言朋黨者。夫小人懷私，常以利動，不顧忠義，自成朋黨……。夫聖賢合跡，千載同符，忠正端慤之人，所以知獎，亦是此類，是同道也，非謂黨也。」（「對憲宗論朋黨」見全唐文卷六四五）

又裴度說：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君子小人，志趣同者，勢必相合。君子爲徒，謂之同德；小人爲徒，謂之朋黨。」（見通鑑憲宗元和十三年十二月）

又李德裕說：

「臣以爲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爲朋黨。」（見通鑑文宗開成五年）

又說：

「治平之世，教化興行，羣臣和於朝，百姓和於野，人自砥礪，無所是非，天下焉有朋

黨哉！仲長統所謂：同異生是非，愛憎生朋黨，朋黨致怨讎者也。……今之朋黨，皆依倚倖臣，鼓天下之動，以養交游，竊儒家之術，以資大盜，所謂教猱升木，噬犬害人，穴居城址不可薰鑿。」（「朋黨論」見全唐文卷七〇九）

綜觀以上三家議論，雖然有些指斥是針對特定個人而發（參下章「黨人論朋黨」一文），但他們對朋黨的共同體認，則可歸納為如下諸重點：

(1) 朋黨是基於私利的結合。而君子之道義相惜，謂之同德或同道。所以君子特立不倚，小人好為朋黨。

(2) 朋黨之罪狀不可確指，所謂「尋之則無迹，言之則可疑」。凡為君主皆惡之。

(3) 小人多藉「朋黨」之詞以誣陷君子。

所以在當時，「朋黨」一詞，顯然被公認為「結黨營私」之意。既然朋黨的界說，有了是非的判斷，於是必定有人會問：「牛李兩黨，誰才是真朋黨？」

二、辨識朋黨的困難

在「朋黨」的辨識上，李絳著重於「義利之辨」。所以他強調「小人懷私，常以利動，不顧忠義，自成朋黨」。而裴度則提出「小人君子之別」。於是他說：「君子為徒，謂之同德，小人

爲徒，謂之朋黨」。其實二人的辨識態度是一致的，都是承襲於儒家的思想。卽如論語里仁篇所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的意思。

而且裴度和李德裕又都以爲，辨識「朋黨」，往往取決於君主的是否聖賢。裴度說：「（朋黨與同德）外雖相似，內實懸殊，在聖主辨其所爲邪正耳」。李德裕也說：「致理之要，在於辨羣臣之邪正，夫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人主辨之甚難。」

可是這種辨識的方法，運用上似有困難：

第一：君子、小人爲人格標準的二分法；是否適用於由多數人組成的朋黨，以及他們的政治行爲。

第二：君主是否有分辨的能力，以及他是否肯去分辨。

於是仍然留給我們兩個困惑的難題：

（一）究竟兩黨中誰是君子，孰爲小人

「牛李」兩黨中，包括了許多政治利益、地緣、社會背景等相同者的組合，其中各有君子，各有小人。而且「牛李黨爭」是長達四十餘年間，若干事件的總稱，我們實無從藉此以肯定牛李兩黨，誰的人格較高。而且政治行爲，有時受制於最高決策，而政治衝突實又無關於義利。所以我只能從反面立論：

李德裕不是小人，就以他提携孤寒的行爲可證。如舊唐書卷一七七劉鄴傳載：

「劉三復聰明絕人，善屬文，少孤貧，母有廢疾，三復丐食供養。長慶中，李德裕拜浙西觀察使，三復以所業文詣郡干謁。德裕閱其文，倒履迎之，乃辟爲從事。」

又如太平廣記一八三貢舉條說：

「進士盧肇，宜春人，有異才。德裕嘗左官宜陽，肇投以文卷，由此見知，後隨計京師，待以優禮。」

又如他的「薦處士李源表」說：

「源嘗守沉默，不語是非，或心交靜求，理契深要，一言開析，百慮洗然。致君阜時，指象如見；抱此貞用，棄於清朝。臣竊爲陛下深惜。伏乞就授一官，召赴京闕。」（見會昌一品集、補遺一）

所以當李德裕被貶崖州時，據說有「八百孤寒齊下淚，一時回首望崖州」（見范攄「雲溪友議」）的感人場面。而且李德裕又有接納牛僧孺朋友的雅量。如舊唐書卷一六八韋溫傳說：

「李德裕作相，遷（溫）禮部員外郎，或以溫厚於牛僧孺，言於德裕。德裕曰：此人堅正中立君子也。」

又如柳仲郢，曾爲牛僧孺鎮江夏時，辟爲從事。而李德裕不以爲嫌，依然重用他。見舊唐書卷一六五柳公綽傳：

「德裕奏（仲郢）爲京兆尹。謝日，言曰：下官不期太尉恩獎及此，仰報厚德，敢不如奇章公門館。德裕不以爲嫌。」

凡此種種作爲，都可以表示，李德裕不是小人。但是李德裕的門人韋瓘，撰「周秦行紀」等文以誣害牛僧孺、楊虞卿，則又是小人行徑（見本論文第三章第參節第三項「周秦行紀的再審視」一文）。

再者，牛僧孺也不是小人。如舊唐書卷一七二本傳中說：

「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賊當死，賂中貴人爲之申理，僧孺堅勢不同。穆宗面諭之曰：直臣事雖僭失，然此人有經度才，可委之邊任，朕欲貸其法，僧孺對曰：凡人不才，止於持祿取容耳。帝王立法，束奸雄，正爲多才者……上嘉其守法，面賜金紫。」

這是牛僧孺不畏權貴，守法不阿的表現。又如本傳中敘及他不貪污的操行。說：

「初韓弘入朝，以宣武舊事，人多流言。其子公武，以家財厚賂權幸及多言者，班列之中，悉受其遺。俄而父子俱卒，孤孫幼小，穆宗恐爲厮養竊盜，乃命中使至其家，閱其宅簿，以付家老，而簿上具有納賂之所。唯於僧孺官側，朱書曰：某日送牛侍郎物若干，不受，卻付訖。穆宗按簿甚悅。居無何，議命相，帝首可僧孺之名。」

凡此種種都說明，牛僧孺也並非小人。但是牛黨中人李逢吉，構于方獄以排斥元稹、裴度，挑撥韓愈與李紳，使臺府不協，又結納宦官，聚集張又新等爲「八關十六子」（見舊唐書卷一六七、新唐書卷一七四李逢吉傳）。新唐書就說他是「性忌刻，險譎多端，及得位，務儷好惡」的小人。

所以清代徐賓在歷代黨鑑中說：「牛李之相仇，此以君子而攻君子者」。真是甚中肯綮。可是牛李二黨中，卻又有營求私利的小人，則二黨自爲「朋黨」無疑。

(二) 君主的對待態度

既然牛李二黨中君子、小人皆有，則君主的分辨邪正就益形重要。但有時「朋黨」之勢既已形成，牽涉範圍過大，弭平已屬不易，君主縱使有圖治之心，恐也無能爲力。如文宗以二李（李宗閔、李德裕）朋黨，但又欲繩之而不能去，嘗對侍臣說：「去河北賊非難，去此朋黨實難。」（見舊唐書李宗閔傳）

有時，君主則是有意利用「朋黨」間衝突的微妙關係以爲相互牽制之用。如敬宗寶曆元年十二月，敬宗爲了阻止李逢吉勢力的坐大，從興元召回了裴度，果然發揮了牽制作用。又如李宗閔在文宗大和三年八月，假藉宦官之助而取得了相位後，引薦了牛僧孺，對李德裕黨大事排斥，勢力不斷擴張。於是文宗在大和七年，就引用了李德裕，果然使李宗閔黨大爲收斂。（參本論文第一章「牛李黨爭的始末」第二節第一項「帝王的牽制策略」。）

顯然，唐代有些帝王，都缺乏徹底清除「朋黨」的決心，而僅作權術的運用，無怪乎它會延續了四十餘年之久。